



博大会通 知行合一

——贺云翱先生访谈录

◆ 贺云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肖 宇

(常州博物馆)

◆ 黄督军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贺云翱先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委员。1957年生于江苏宝应,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进入南京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期间参与《东南文化》创刊,并长期担任编辑部主任。1996调入南京市文物局,1997年主持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担任业务负责人。2002年至今,执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并于2003年创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学术兼职包括: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古代城市考古、公共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四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江苏省钱币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中文版)专家委员会委员,《大众考古》主编,《东南文化》编委会副主任,等等。曾主持“六朝帝王陵考古”“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考古”“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梁南平王萧伟墓阙考古”“南京六朝石头城遗址考古”“南通如东国清寺遗址考古”“苏浙皖六朝青瓷窑址调查”等,其中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入评“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主持国家级、省市级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

保护、世界遗产申报、城市文化发展规划等课题200多项。发表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区域文化史等领域的论文和论著数百万字,代表著有《历史与文化》《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帝王陵寝》和《文化遗产学论集》等。

肖宇:贺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您是一个研究领域宽广、社会活动丰富的学者,拥有较大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也曾接受过多个学术媒体的各类访谈。这次访谈我们计划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办刊兴学与学科教育、公共考古与时代担当,企望能总结您的学术贡献、捕捉您的学术个性,并从中汲取启示。

一、成长经历与治学经验

肖宇: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批大学生普遍具有命运骤变的传奇经历、惜时如金的求学岁月、如饥似渴的知识欲求,请回忆一下您的考学经历和大学生活,您是如何选择和学习考古学的?

贺云翱: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话题,在高考之前,我实际上是一位农村青年,大学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命运走向有着特殊意义,因而这段经历也显得至关重要。读大学前,有三方面对我成长影响较大,也

可以说是我成长经历的三个阶段。其一是家庭环境，我出生于扬州市宝应县的农村家庭，母亲不识字，父亲曾当过农村代课老师，上小学之前我就认识很多字，酷爱读书。村子里能借到的书，我基本上都找来翻阅过，其中还包括一些古籍，因而我当时有个“书呆子”的外号。那时候，尽管家里很穷，但周末父母总会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县城买吃食，我用这一毛钱在街边书摊上饿着肚子看一整天的书，那种饥饿感，我至今记忆犹新。读中学时，我订阅了不少杂志，诸如《朝霞》《化石》和《地理知识》等，后来还订过《大众科学》。我大学选择考古专业，恐怕或多或少受了《化石》《地理知识》的影响。其二，从小学到高中，我分别就读于圆沟小学、齐心中学和宝应县中学，一直担任班长，从中很受锻炼。初中毕业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教育“回潮”，提倡考试升学，我才得以考入高中。我很感谢我遇到的老师，尤其是高中班主任张贞庆老师，他对我人生影响很大。记得有一段时间，张老师因为哥哥在锅炉爆炸中逝世，将班级管理暂托给我，我带领班上同学阅读《红楼梦》，并组织相关讨论。其三，高中毕业回乡后，我在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了一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兽医学的各门课程，接受了不同背景的学科知识，我也感谢这段特殊的学习经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已在社会上悄然传开，而我却全然不晓，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张贞庆老师辗转托人给我捎来口信——可以考大学了！我立刻赶回县城，来到张老师家。师娘已在厨房为我搭起床铺，让我住下复习。那段时间，张老师帮我找来各种复习材料，师娘给我们准备饭菜，张老师还不时带我去看电影，以舒缓压力，我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看的是《白毛女》。实际上，留给我备考的时间不足一个月，1977年高考学生有一个特点，主要依靠原来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填报高考志愿时很有意思，我不敢报好学校，一开始填报的是扬州、高邮和盐城的师范院校。张贞庆老师看后觉得不妥，让我要么考南京大学，要么考北京大学，于是我改报南京大学。读高中时，我的外语、语文和历史三门功课最好，还时常与张老师讨论历史问题。在专业选择上，我本打算报中文系，张老师则建议学习历史专业。张老师从招生办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到乡下，送达我家时已是晚上。隔了数日，我特地去了趟张老师家，当面感谢他。那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学生优秀，便会竭力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

下老师，如此而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县广播台邀我去录节目，谈谈农村青年怎样考上南京大学。直到这时，我和我的家人才感觉到那份源于知识的荣誉感。



1978年12月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合影

1978年2月，我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除了培养过几届考古学“工农兵大学生”，尚未开设考古学本科，大约半年后开始分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学。这一选择源于我的两个简单判断：一方面，考古学的课程远比历史学要丰富，能够学到更多知识；另一方面，“体质人类学”等课程名称让我想起了《化石》杂志，觉得考古学与科学更紧密。直到现在，我上课也会时常对学生讲，作为考古学家，你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科学家。

我那届是南京大学“文革”后首届考古学专业，包括张敏、周晓陆和殷志强等十二位同学。在课程讲授上，除了本系的蒋赞初、张之恒、秦浩和查瑞珍等老师，外聘老师特别多，诸如石兴邦、汪宁生、佟柱臣、安金槐、赵青芳、姚迁、李伯谦、纪仲庆、吴伯旬、朱伯谦、刘叙杰、汪遵国和邹厚本等先生，当年国内许多最优秀的学者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的学者，刚从“文革”十年中走出，对年轻学子满怀爱心。大学

1979年春季青墩遗址考古实习期间
参观南通博物苑



1981年秋季湖北鄂城考古实习期间
夏鼐先生前来指导

二年级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结束后,张之恒老师带领我们参加海安青墩遗址发掘,秦浩老师还带领我们到郑州、洛阳和西安参观实习,第三次实习是蒋赞初老师带领我们去鄂州发掘六朝墓葬。我们在田野实习过程中喜欢写诗,意气勃发,讴歌考古、青春与未来。

我的整个大学生活都沉浸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之中,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不回家”,我寒暑假基本不离校,仅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去淮阴考察韩信史迹,以撰写相关论文,还有一次是回家过春节,在家待了四天。寒暑假是学习的最佳时机,屏除一切干扰,预习下学期课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自由读书。有一年暑假,考古资料室对学生开放,我每天把自己关在资料室,将《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通读一遍。二是“不用热水瓶”,我当时认为用热水瓶耽误时间,因为要拎着热水瓶排队打水,所以大学四年从未使用过热水瓶,即便隆冬,也用冷水洗脚。三是“自我批判”,但凡学习稍有懈怠或时间稍有浪费,我便会会在日记中不断批判自己、反省己身,深感对不起父母、老师与国家。

当然,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本就如此,学生很勤奋,起早贪黑。早上天没亮,我就出去跑步,然后晨读,晚上熄灯后,在楼道里继续看书。甚至,和我同住的室友,数日不见我踪影。学校有助学金,班上我拿得最多,因为我家庭条件最差,助学金一半用以吃饭,一半用以购书,大学四年我从未买过水果。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底子薄,因而学英语特别勤奋,大学二年级就开始阅读外文书籍和刊物,比如英国《古物》杂志,并尝试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翻译。

大学期间,我一直在学生会负责办黑板报,写了数百篇稿子,包括小论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这项工作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毕业之后,把有些考古小论文加以增补,发表在《农业考古》等刊物上。那时候,

我对童恩正先生很崇拜,他的论文、小说和电影,都认真地看过,自己也学着创作考古科幻小说——《天上人间》,在黑板报上连载,纪仲庆先生很欣赏这篇小说。

有次出黑板报,缺了一个“豆腐块”,需要补白,恰好我在报纸中读到一段古汉语,就把这段古汉语抄录下来,添上自己的解释,署了我的笔名。我有二十多个笔名,熟识我的同学能认出。次日,同学周晓陆贴出大字报,指出我剽窃报纸。作为回应,我将我写作的稿纸,贴满宿舍山墙。此事轰动一时,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教训,触动极大,时刻警醒我治学要严谨,即便一丝一毫,也绝不掠人之美。一直以来,我都由衷感谢周晓陆先生,我们之间也保持着长久友谊。

总之,我的大学生活非常充实,也非常艰苦,内心始终怀揣理想。我自己的体会是,好大学就是好本科,好本科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均是以本科学习为根基而铺展开的。

肖宇:金观涛将“八十年代”视作“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高等学府尤其是如此,这对您的成长产生过影响吗?

贺云翱:当时的中国刚刚苏醒过来,高校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也积极参与其中,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大学生解放思想的文章,刊发于《光明日报》。对我更为直接的影响是由此引发的“文化热潮”,学界出现了大量文化讨论的文章,我热衷收集和阅读这类文章。同时,我还以学校黑板报为平台,撰写文章参与文化讨论,涉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我的藏书除考古学之外,数量最多的就是文化学方面的。这对我日后办刊物、搞研究均有影响,以至于后来我写过一本20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建设概论》,文化问题至今都是我关注与思考的主要领域之一。

黄督军:请谈谈您毕业之后的工作经历和学术实践。

贺云翱:1982年毕业时,一方面学校希望我留校,去团委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单位可供选择,包括某些中央机关和高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第一个发掘项目是高邮天山二号汉墓,即西汉广陵王夫人墓,我早晨拎着收音机跑步,自学日语,白天搞发掘,晚上读《二十五史》《十三经注疏》,往往读到深夜。接着是发掘徐州龟山汉墓,即西汉楚王刘注墓,那段时间我比较关注徐国史,接连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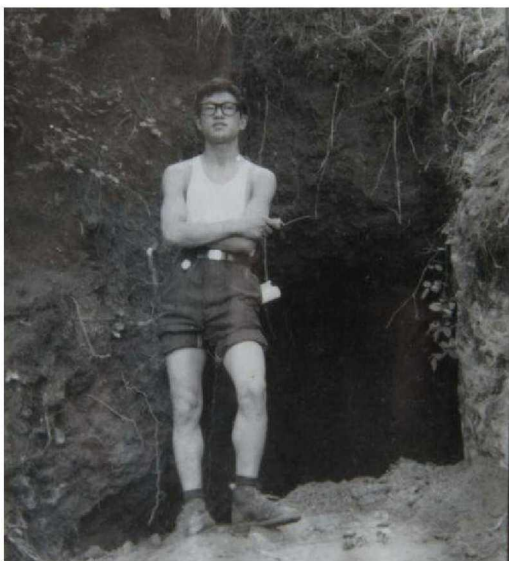
写数篇论文。然后,我跟着邹厚本先生参加宁镇和环太湖地区考古调查,又跟着张祖方先生参加宁镇地区旧石器遗址考古调查。还有句容城头山遗址发掘,当时南京大学开办了“华东五省一市文物干部培训班”,我指导浙江学员进行田野实习。接下来,我又负责扬州唐城南门遗址的发掘。这时候,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意让我去执教,但宋伯胤副院长不同意,他知道我文笔较好,便给我委派了一个新任务——办刊物。

《东南文化》创刊不久,唐云俊先生调任江苏省文管办主任,刊物就交给了我,担任编辑部的第一任主任,这算是我第一次创业。主持《东南文化》近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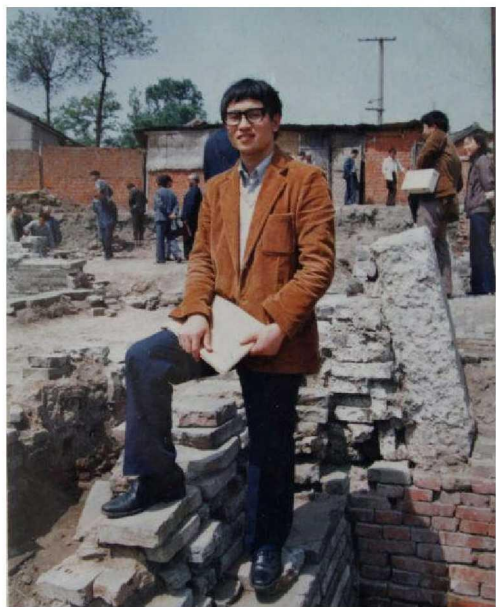
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对她倾注了几乎全部的时间与精力。我的主要工作是设计专栏、写信约稿、编辑稿件、组织会议,读稿量特别大,来往信件堆积如山。平均每天要阅读和修改十几个小时的来稿,日复一日,从无假期,甚至春节也不例外。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管谁的稿子,我都敢提意见。当然,那时候的学者很谦和,不以学术地位论高低,乐于接受编辑意见。《东南文化》的办刊经费相对独立,经济压力很大,我们自己采购电脑,甚至一度自己印刷。办刊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项:《东南文化》杂志的征订收入,编辑部开办实体书店,还有国家文物局的经费支持。90年代初,《东南文化》在全国乃至海外已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力,当时国家文物局考古处李季先生曾对我说:《东南文化》是中国考古界的一面旗帜。

1989年,南京博物院在日本福岡办展览,我因此赴日出差,与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相逢于京都,由此读到了阮先生《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手稿。这篇论文观点新颖,在国内竟一时无刊物愿意发表,我当即判断这是一篇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并安排《东南文化》迅速编发,见刊后在中日学界产生轰动。1990年夏天,阮荣春先生邀请我、北京大学刘俊文先生以及日本龙谷大学三位学者,共同组成“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班。我负责具体联络和安排调查,带领中日学者调查了中国十余省份上百个县市的相关遗迹、遗物,发现近300例实物资料,在成都、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这时候,出现了我人生的第二次教训。我在调查过程中承担了大量工作,将相关实物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编排次序,撰写条目,最终将《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书稿交付文物出版社编辑黄文昆先生。黄先生知道大多数工作出自我的手,便建议将我作为第一署名者,后来阮荣春先生因此颇感不悦。我因一时贪念,而失去了一位多年挚友。我铭记了这段教训,后来也常和学生讲,做学问勿存贪欲。

1995年,我因故离开南京博物院,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一度在南京大学兼课,并参与宁镇地区的考古发掘。这时,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给了我一项课题,对龙泉寺遗址进行发掘与复建,期间我整理了大学毕业后发表的论文,集结成《历史与文化》一书。1996年,我调入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创业,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南京市鼓楼以北的考古工作,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南京城市考古。这期间的重要发掘,包括明孝陵、明东陵、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梁南平王萧伟墓阙遗址、栖霞山



1983年8月南京古代墓葬发掘



1984年5月扬州唐城南门遗址发掘

石窟,等等。还主持了明孝陵“申遗”的学术研究事务,协助筹建明孝陵博物馆、明东陵遗址公园,开展六朝瓦当系统研究。同时,我还参与南京市文物鉴定和文物市场管理,在文物鉴定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

2002年,我从南京市文物局调至南京大学,开始了我的第三次创业,创办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之所以要成立这个科研机构,首先是学科发展趋势,通过明孝陵“申遗”实践和国内外文献研读,以及与国际专家的交流,可以预判文化遗产学科的广阔前景和社会需求。其次是外部环境影响,当时北京大学已成立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杨志刚先生告诉我,他们也有意成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再次是个人工作经验,此前我有创办《东南文化》、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经历,深谙平台与团队对于科研事业的重要性。此外,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创办过程中,国家文物局郭旃先生多有启迪。我的想法是,通过这一机构来做文化遗产研究链,从考古学对遗产的发现,到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再到遗产知识的传播。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将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人组织在一起,共同面对实际问题,坚持基础研究,同时转化为应用研究。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的大课题,需要调动多方面知识去提炼与驾驭。

肖宇:您的工作经历与学术实践类似“三部曲”,从《东南文化》到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不同阶段都有着“从无到有”的“创业史”,不同阶段也都存在不同旨趣的学术取向。六朝考古无疑是您用力最勤的考古学研究领域之一,您缘何如此重视六朝考古?从考古学到文化遗产学,不同研究专题或研究方向的调整与取舍,这种跨学科式的学术转向需要更多的勇气,是什么促使您关注文化遗产问题并下定决心开展系统研究?

贺云翱:我的六朝考古研究,首先得益于本科期间的学习,六朝考古课程由蒋赞初先生执教,教材是宿白先生编写的,罗宗真先生、李蔚然先生也时常给我们授课。其次,编辑《东南文化》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六朝考古的稿子,能够把握该领域学术前沿。再次,参与“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课题研究,实际上已涉猎了大量六朝考古材料,并在六朝佛教考古方面有所收获。这些都为我研究六朝考古夯实了基础,而真正专注于六朝考古,还是主持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期间。我做考古喜欢通过主动学术探索和发掘接近研究目标,而非在配合发掘中寻找研究目标。我打算做栖霞山石窟考古时,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同意,

我一游说,阐明价值意义,国家文物局才得以批准,发掘资料后来交给了宿白先生的团队。南京六朝考古的第一座礼制建筑、第一座寺庙、第一座道观、第一座陵阙、第一座城址,都是这样一步步有计划开展的。

从考古学到文化遗产学,不光是转变,更是延伸。文化遗产学是考古学的延伸,研究文化遗产学首先要学好考古学。龙泉寺的发掘、复建与展示是最早的尝试,自己做复建规划,邀请东南大学朱光亚先生参与建筑复建设计。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明孝陵的发掘与“申遗”,1997年,我产生了研究明孝陵的念头,并制定考古调查勘探计划,此后数年对陵宫内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廓清陵园布局。2000年,我担任明孝陵“申遗”专家组组长,负责挖掘明孝陵历史内涵、执笔“申遗”文本、阐释遗产核心价值,从而对世界遗产事业生发了研究兴趣与深刻认识,并接受国际文化遗产学的相关公约与理论。除了“申遗”这个机遇,长期以来,对知识的广泛涉猎,尤其是对文化问题的重视,成为我开拓文化遗产学的铺垫。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始终有一个理想:用自己所学为社会服务。文化遗产学让我找到一个用知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实践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极具现实意义。自1987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各地政府“申遗”热情持续高涨。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凸显了地域文化底蕴,提升了公众的遗产认知水平,也给遗



2000年8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讲解明孝陵考古发现

产地带来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事业重要性的认识。

肖宇:《大众考古》月刊的卷首语一直由您亲执笔,所涉内容包罗万象,观点新颖独到,颇具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惊叹您笔耕之勤勉、思维之敏锐。那么,您是如何进行自身知识构建和思维训练?

贺云翱:始终保持学习状态,面对新课题以及未知领域,以一名学习者的姿态进行大量阅读,这一习惯我保留至今。学生时代,我就从未被专业课程牵着鼻子走,培养出一一种比较自觉的自我期待,能够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设计与规划,大量阅读,大量思考,大量写作。我现在撰写《大众考古》卷首语,还时常参考那时候的日记。比如,我曾一度想成为旧石器考古学家,就在日记中设计需要学习的课程、需要阅读的书籍,特地去地质系选修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并记录学习心得。我还记得我的地貌学课程论文是《论人类地貌学》,获得了地质系老师的认可。此外,我还选修了地理系的城市历史,哲学系的美学、心理学,等等。当时,南京大学的学术讲座特别丰富,不乏各领域大家,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物理、化学,各学科的讲座我都去听。实际上,这就是架构知识结构、磨砺思维锐度的过程。

在我看来,所有学科都可以服务于自己的学术理想。课程、书籍乃至特殊的人生际遇,会让你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每一次选择都会扩充你的知识、深化你的理解。

肖宇:从您的切身体会出发,您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有何建议?

贺云翱:关于治学心得,我在学习与工作阅历中已有表述,只想提一下理想与责任。我觉得年轻人不能丧失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对一个人的成长极其重要。所有能成就事业之人,都是站在社会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社会也会为其理想提供支持。无须讳言,这也许是现代不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欠缺的。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遭人嫉妒、被人打击、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不能放弃,为理想而坚守。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内心才能承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勇往直前,才有幸福感。你夸赞我,我不因此高兴,你贬低我,我不因此恼怒,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淡然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的道路,有收获,有艰辛,也有教训,但我始终觉得我是幸福的。

在我心目中,学者是人类文化精英,内心应葆有公平、正义,无论年龄、出身,都是平等而独立的完整生命个体,共同营造公允的社会环境,进行自由的学术创造,相互感恩,开拓人类的文化事业,观照人类的历史与现实。

二、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

肖宇:您对六朝都城研究卓有建树,围绕此进行过多项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收获,能否介绍一下石头城的发现和研究?

贺云翱:我跟随蒋赞初先生在鄂州吴王城开展过发掘,也参加过刘建国先生组织的镇江铁瓮城发掘,并协助召开“城市考古学术座谈会”,当时《南方文物》还刊发了一期“城市考古专号”。这一过程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吴的崛起历程,从铁瓮城到石头城,再到吴王城,以长江天堑构筑政治据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东吴是六朝的开启者,石头城是南京建都的肇始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石头城的具体史迹,却云遮雾罩、颇多争议。仅石头城的地望,就有四望山说、草场门说、清凉山说、汉中门说等等。我当时认为,找到石头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便可获得空间认定与合理阐释。

1998年,我开始寻找石头城,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对石头城的位置已有些线索与预判,并邀请江苏省地震局张治天先生对地下埋藏情况进行科技探测,我再组织发掘验证。次年,我开挖了一条探沟,探沟中发现一座墓葬打破城垣,随葬青白瓷盒盖上有铭文“江南官膏伍两”,与南唐晚期李煜称“江南国主”的记载相印证,由此明确了城垣的年代下限。同时,探沟中还出土了东吴、东晋和南朝的砖瓦。通过这条探沟,基本确认了六朝石头城的发现。2008年以



2010年5月于韩国韩神大学考古系观察百济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2011年1月南京六朝石头城发掘

后,我持续多次对石头城进行考古,发现了城门、角楼、砖铺路面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年代从东汉末期持续至隋唐,使得南京建都史在石头城中变得鲜活起来。这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一方面石头城出土遗物与日韩等国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石头城的山城模式与新罗、百济、高句丽也有类似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石头城出土一块城砖,砖上赫然出现“石头”二字铭文。这使人莫名冲动与感慨:你坚持不懈地对某一遗存进行探索,她也会在某一时刻帮助你实现理想,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过程。

黄督军:作为南京城市考古的参与者、南京城市历史的研究者,请您谈谈南京城市考古的主要历程及方法。

贺云翱:我喜欢长时段的看问题,历史如此,人生亦是。读大学时我就喜欢城市考古,搜集了大量资料,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都做成卡片,重要的图片用硫酸纸摹画。我抱着这些资料找到东南大学刘叙杰先生家中求教,刘先生一张一张翻阅我摹的图,鼓励我将来在城市考古领域做出一番成绩。后来,我竟然真去做城市考古,除了因缘际会,大概有些许“不忘初心”的意味。

90年代,开展“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的很少,成都、广州和洛阳做得比较早。此外,我认为刘建国先生也是城市考古的先驱者之一,1993年成立镇江古城考古所,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镇江城市考古。我和刘先生互动较为频繁,从中获益不少。市区没有空间进行考古发掘,地层叠压情况难以探明,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刘先生发明了“探井”,圆形的井壁抗压能力强,可以挖得比较深。靠这个办法,把握城市关键点的地层情况,从而廓清城市历史演进的基本时空特征。

1997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成立后,我第一次提

出南京城市考古的命题,当时南京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郊区的墓葬发掘,与此同时,大规模城市建设对地下遗存破坏严重,让人痛心疾首。但我们也只能采取“见缝插针”的工作模式,紧盯城区的各个工地,建设过程中一旦发现遗迹暴露,我们就采集标本、记录地层、拍摄照片,力求有所抢救。数年间集腋成裘,竟记录了上百个遗址点,采集的标本堆满库房,其中也不乏斗争、妥协与心酸,这构成了我撰写《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一书的基本材料。

黄督军:在对六朝考古研究过程中,您构建了六朝瓦当研究的学术体系,这是您重要学术创建之一,可否介绍下这一研究的心路历程?

贺云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六朝瓦当的情形,图案新颖诡谲的人面纹、兽面纹瓦当,使我内心强烈震惊与好奇,从中窥见与秦汉瓦当体系迥异的一种文化风格。但这些零星出土的六朝瓦当,从未有过系统梳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南京城市考古调查过程中,我目验了千余件六朝瓦当实物,逐步酝酿相关认识,对六朝瓦当的类型、谱系、期别及文化内涵进行思考。1998年,“六朝文化国际讨论会”在南京召开,我提交了《六朝瓦当初探》一文,首次构建六朝瓦当的类型体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瓦当犹如六朝考古之锁钥,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梁南平王萧伟墓阙遗址、钟山二号寺庙遗址均是以瓦当为学术引导而发现的。当年我们在明孝陵陵区内开展文物调查时,在密林中发现一处石墙遗迹,并发现了半个莲纹瓦当,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南朝早期瓦当,随后决定正式发掘,从而揭露了六朝坛类建筑。2003年前后,我陆续撰写多篇论文,阐述六朝瓦当研究收获。

研究六朝瓦当的过程中,势必牵涉瓦当出土地点与都城建筑空间的对应关系,这既是瓦当研究的应有之意,也是瓦当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换言之,文物研究的目的是究明历史真相与文化运动轨迹,六朝瓦当研究的目的则在于六朝都城史、建筑史、文化史。2005年出版的《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正是以瓦当为线索,阐发其与六朝都城的关系,据此进行六朝都城复原研究,涉及六朝都城、宫城、礼制建筑和太学等,以瓦当构筑六朝都城的时空结构。

黄督军:您对宗教遗迹似乎情有独钟,主持发掘了龙泉寺遗址、定林寺遗址、栖霞山石窟、洞玄观遗址及国清寺遗址,这也是兴趣使然吗?

贺云翱:宗教考古也是我感兴趣的内容之一,这些宗教遗址的发掘实际上都带有一定的主动性与目的性。宗教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拥有非凡意义,需要从考古学的视角去揭示与阐释。以佛教为例,佛教从南亚、中亚到东亚、东南亚,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带动更加全面的文化分享和文化创造。再者,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极其深刻,它几乎重塑了中国的诸多文化形态,尤其是在思想、语言、艺术、哲学、文学、建筑和民俗等方面。随着和海外学者交流的日益密切,尤其与日韩相比,中国的宗教考古十分薄弱,大量宗教寺观旧址没有得到起码的考古发掘,就在原址复建或扩建中遭受破坏,专业研究人员尤显稀缺。因此,这几年我着力培养了多位佛教考古方向的硕博士或博士后。



2017年11月南通如东国清寺遗址发掘

肖宇:“什么是考古学?”是个常论常新的命题,您在《大众考古》卷首语中多有讨论,这些讨论既闪现出思想的光芒,也浸润着情感的关怀,请谈谈您对考古学的认知,您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何预判与期许?

贺云翱:这确实是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本身并非一个恒定的、封闭的概念,夏鼐先生对考古学的经典表述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在其发展历程之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考古学者对其学科地位与价值存在不同认知。随着时代发展,考古学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回想一下,我们今天对考古学的理解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已判然有别。

我倾向于考古学研究的是历史与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指历史形态的文化,既承载着社会科学的责任,同时也承载着人文科学的使命,是对人类物质

世界、精神世界的完整观照。考古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所以考古学应欢迎多学科介入,单一依靠历史学会制约考古学学科价值的实现、学科地位的确认。考古学研究的古代世界,涵盖几十个或上百个现代学科分门别类的研究内容。学术目标的无限性与个人知识的有限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解决方法就是多学科介入,考古学家应该努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我眼中,没有成熟的考古学家,因为考古学涉及的内容异常复杂多元而放弃追索。考古学职业人,应是最谦虚、最好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能够在实践中能够认识到考古学的浩瀚性、广博性和无限性。

考古学可以衍生出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生物考古、建筑考古、城市考古等诸多分支学科,这是考古学的多样性。但是,考古学不会解构于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建筑学等学科之中,这是因为考古学具有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物质认知特点,以物质作为认知起点进行学术探索;另一方面是材料获取特点,以田野考古获取古代人类信息;再一点,是资料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因此,考古学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的学科。

目前,考古界应当意识到考古学的统一性中存在可以被分割成各相关学科的多样性,而不应将考古学视作封闭系统。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选择读考古学研究生,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他们也能够成长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尤其是在原来所学科领域中进行考古学探索,他们背后隐藏的另一套知识系统可能会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被激活。近年来,有些考古机构在招聘中存在一种偏见,不要本科非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这显然不公平,不利于考古遗存多样性内涵的揭示,也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远发展。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应该具有更博大的胸襟与更专业的姿态。工业学院可以有工业考古,农学院可以有农业考古,建筑学院可以有建筑考古,音乐学院可以有音乐考古,艺术学院可以有美术考古、佛教艺术考古,各种门类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均可开拓考古学的新领域,中国考古学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繁荣,才能实现应有的学科地位。相反,如果中国考古学仅仅设置于高校历史系,囿于这种格局,考古学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考古学的资料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挖掘。现在大多数考古研究所还是以时段划分科室,缺乏鲜明的专题研究分工与

学科特色。古代人类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需要探究其运动规律,但目前的现状是考古资料信息流失严重,因而有必要大力发育专业性较强、专业优势明显的考古研究机构。考古学的知识建构带有独创性,考古学更重要的是各种人类思想的发现、思维系统的发现、活态文化过程的发现、人地关系的发现,如果中国考古界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学术训练与实践,会让考古学更加深邃、更有意义。

肖宇: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贺云翱: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自身便具有全球性,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具有舶来性。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样性,既是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文化过程的多样性,多样性亦即特色性。理解中国特色考古学,首先要建立上述认知基础。其次,中华文明的特色性要放置于全球视野中思考,要有考古学的全球文明比较研究。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原生文明,在发展道路上引领东亚,但是东亚各国又有自己的文明发生发展道路,同样需要考古学的比较研究。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华文明的过程中,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需要建构自己的内在逻辑,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论。再次,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中国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考古学要为人民福祉,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目标之一。

从全球化的学术背景,到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通过中国考古学及其研究成果,世界得以观察一个文明的成长轨迹,理解一个文明的内涵特质,思考人类的普世问题。可以说,缺乏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也必然丧失其全球化意义。

肖宇:您是“宜兴窑”窑口命名的倡导者,从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宜兴窑开展过精深而全面的研究。对“宜兴窑”物质文化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揭示,既可以实现不同学科间的相互启发,也加深了文化事项的全貌观察,这一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请您谈谈对宜兴窑的探索过程、研究收获。

贺云翱:我在明孝陵“申遗”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从中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当时国内称为“民族民间文化”。直到2004年左右,国内才普遍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回母校执教后,立刻发愿——在全国高校中首

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我分别给扬州市政府、宜兴市政府写信,建议扬州雕版印刷术、宜兴紫砂工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市政府方面很快表达了合作意愿。那么,为什么会首先关注扬州雕版印刷术、宜兴紫砂工艺呢?这和我的考古学背景有关,不少著名考古学家均有深厚的雕版印刷研究功底,如郑振铎先生、宿白先生,宜兴紫砂工艺的物质呈现是紫砂陶器,其本身便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我带领学生采取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对十位紫砂工艺传承人进行访谈,抢救一批濒临消失的口述资料,集结成《紫砂大师访谈录》一书,这是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重要尝试,开风气之先。我先后开展了紫砂、均陶、堆花、龙窑烧制技术、文化生态等一系列与宜兴陶瓷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基础调研。我将宜兴视为第二故乡,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带领十来个学生在宜兴连续调研48天。宜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是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个案,为我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研究经验。

几乎宜兴所有的窑址,我都跑了一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陶瓷史中何以没有“宜兴窑”?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宜兴各类陶瓷器的命名非常芜杂,诸如“宜兴陶”“宜兴壶”“均窑”“欧窑”和“蜀山陶”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造成了大家对宜兴陶器创造的不确定性。

“窑口”实际上是指某特定地域生产的具有一定自身原料、器物造型、釉色及装饰和工艺特点的陶瓷器类、器种、器系,从考古学上说,其实就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拥有自身特色的某个“陶瓷文化共同体”。中国陶瓷业的“窑口”一般都以该窑口所在地较大的行政区予以命名,这是中国窑口命名的宝贵传统,它表明“窑口”是陶瓷生产地域、生产技术系统、生产产品系统及由它们构成的某种综合性文化传统的集成概念。因而,我撰写《“宜兴窑”初论》一文,为“宜兴窑”正名,并阐述其内涵与历史。

从方法论或研究经验的角度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思考,能够大大提升考古学研究的认知能力。每个遗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当时的操作系统与思维系统,或者说具有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内涵,近年有学者提出“精神考古”,从遗物中挖掘活的文化过程,这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也是值得肯定的。

肖宇：历史学、考古学作为现代科学在中国有着近百年或逾百年的研究实践，文化遗产学作为后起之秀，与这些相关学科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区别？进而言之，文化遗产学有何学科特质？

贺云翱：历史学科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文字为中心的文献史学，第二阶段出现了以实物资料研究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第三阶段则出现了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保存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囊括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学科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史料的拓展，从文献到实物遗存，再到活态的“非遗”资料。其次是方法论的拓展，从文献考证到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等，再到文化遗产学更为丰富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再次是范围的拓展，从文献记载时期到人类历史全过程，再到当下的鲜活历史。最后是功能的拓展，文献史学主要以古史考证及书本知识为取向，考古学强化了历史遗存的阐释与展示，例如出现了各类博物馆、遗址公园，文化遗产学则进一步拓展这种功能，让现代人认知、参与，让未来人传承，甚至能促进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与创新，让历史更好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文化遗产学的出现符合历史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并延续与发展了历史学科的价值：将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支撑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历史学科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认知水平的进步，更体现了人类对历史的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学科变革与学科创新。

文化遗产学所需的知识背景是立体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文化遗产学研究必然会涉及诸多学科，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和建筑学，等等。但文化遗产学不止于某一方面的专门化研究，其学术目标带有社会性、现代性，学科指向是“现代”和“未来”，即如何让历史上保留至今的“文化事项”走向未来、服务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学试图实现人类文化在过去、今天和未来的统一。

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学科特质，我觉得至少存在四个方面。其一，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发现”的学科，发现某种“文化事项”的发生、发展、流变或式微，能够在不经意之处洞察文化生命体、钩沉文化历史，有些领域在文化遗产学诞生以前甚至无人涉及。其二，文化遗产学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资源的发掘，许多濒临消亡或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古代遗产，长期排除于现代生活之外，文化遗产学赋予其认知地位、现代价



2010年9月陪同单霁翔先生考察三峡库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值与发展空间。其三，文化遗产学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文化遗产在价值内涵分析之外，还需要进行科学的保护、认知、传承、利用、创新与管理，从而发育出一个庞大的社会运作体系。其四，文化遗产学会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其价值，生产力及社会文明发展水平越高，文化遗产的稀缺性价值就越会凸显，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精神追求就越强烈，这也是近年来文化遗产学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肖宇：请您谈谈目前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现状。

贺云翱：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遗产运动，新世纪之初，文化遗产学在高校中逐渐兴起，近些年更是发展迅猛，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文化遗产学的相关课程，并培养硕士、博士，因而我们对文化遗产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但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不应简单的和经历百年发展的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文化遗产学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还有巨大的学术研究空白、学科发展空间。

目前高校中，对设置文化遗产教学方向非常重视，而且呼声颇高，但是回到实践中来，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文化遗产学涉及面宽、跨学科的特点，知识结构完善的教师、理论方法成熟的教材以及相关专业课程的设置，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需求，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略显乏力。

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至少有两方面亟需我们努力。其一，教育主管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和高校应加强互动，顺应学术趋势和社会需求，勇于打破原有

学科框架的局限,推动教育及学术体系创新。其二,高校教师应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学实践,将学科建设、教书育人与案例实践结合起来,在具体而深入的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发现知识、提炼概念,从研究者的切身体会中逐步凝练出学术研究的路径、方法与理论。

三、办刊兴学与学科教育

肖宇:您是《东南文化》的创办人和编辑人之一,请您回顾一下杂志的创刊过程、刊物定位与办刊方向?您在主持《东南文化》编辑部期间,有哪些办刊理念与举措?

贺云翱:1984年秋天,南京博物院决定创办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关于刊名大家各抒己见,诸如“文博学报”“考古与民俗”等。我也琢磨出一个刊名,叫“东南文化”,主要关乎两方面原因。其一,我在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时关注过“胡焕庸线”,即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一线,将中国划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片区、面向内陆的西北片区,而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与经济集中于东南片区,这是中国经济及文化地理的重大发现,凸显了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性,



1991年冬季于《东南文化》编辑部



2011年1月拜访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伯泉先生

刊物应以中国东南地域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二,这一综合性刊物所承载的研究视野,兼涉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俗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等,而研究对象又涵盖物质、技术、制度和精神等方面,适宜以“文化”来概括,这其实也源于80年代的“文化热潮”。此外,当时《考古与文物》已创刊,代表西北地区,而东南地区也应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刊物。

刊名既定,《东南文化》应运创刊,我们分别邀请顾廷龙先生、赵朴初先生题写刊名。我那时发誓,要把《东南文化》办成有别于《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的优秀杂志,我一开始就有这种决心与理想。1985年,《东南文化》第一辑出版,前三期以书代刊,1987年刊号获批,《东南文化》正式成为双月刊杂志。

我主持《东南文化》编辑部期间,在梁白泉先生支持下,有以下几点办刊理念与举措。第一,秉持“学术者乃天下公器”的原则,竭力追求学术独立,按照学术理想办刊。只唯学术,在取稿上,既求创新,又求扎实,不论作者的身份与资历。第二,扶持优秀青年学者,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活跃学术气氛,陈星灿、陈淳、裴安平、曹兵武和吴春明等先生均是当年《东南文化》的先锋作者,不乏观点尖锐鲜明的文章。第三,捕捉学术热点,乃至促进学术热点的形成,办专栏吸引学者撰稿,这是一种学术创新方式。刊物不光要培育学术,更要引领学术,编辑不能被被动地组稿,应具备学术前瞻性与敏锐性。《东南文化》专栏设置,推动了一些专题研究的深入,诸如“吴越文化”“文化探源”“长江文化”“文化史论”和“当代学者访谈录”等。第四,搭建学术讨论平台,组织学术会议,诸如“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长江文化研究规划与协商会议”“中国滨海地区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徐、淮夷文化学术研讨会”和“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以课题导向带动组稿。

总之,《东南文化》拥有两方面学术特质:一方面,以文化为纲,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寻找一条互通途径,从而繁荣、引领学术发展,打破文博圈子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以文物考古为根柢,旁及其他文化科学,从而使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融竞辉,展现文博系统在学术阵营的独特作用。

肖宇:您后来还主持创办过一些期刊或辑刊,诸如《长江文化论丛》《世界遗产论坛》《大众考古》《中国城墙》《古陶瓷学论丛》和《六朝研究》等,均是特质鲜明的刊物,或是为学术大众化提供普及渠道,或是

为专题研究提供学术平台。刊物不光可以引领学术创新,甚至其本身便是一种学术创新。因此,请谈一谈您办刊经验?您认为什么样的刊物才能葆有学术生命力?

贺云翱:文博工作者或研究者办刊物,本身就是其职业使命使然,责无旁贷之事。进而言之,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对知识进行发现、组织、传承与传播,以不断提升人类的文明化程度。中国的学术刊物数量很多,但考古文博类刊物很少,这是问题之一。考古文博类刊物以综合性刊物为主,缺乏专门性刊物,这是问题之二。因此,中国考古刊物建设任重道远,话语体系、学科建设、学科地位均需要学术刊物来表达。中国考古界应当发育出不同方向、不同门类的杂志,或者在已有著名刊物旗下按照方向与门类增设子期刊。否则,具有学科发展潜力的专题文章难免湮没于大量一般性话语之中,其价值会被冲淡,不利于学科全面化、专门化发展及学术争鸣。这也是近些年我一直在做各类专门性刊物的原因,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对于刊物而言,作者、编者和读者是最核心的三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作者,编者是组织者,读者则是培养出来的,在一定的情况下作者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我在办《东南文化》时,首先会对各研究领域进行调研,了解学术界哪些研究者在从事该项研究,哪些人做得比较深入,哪些人值得期待,再进行约稿与组稿。在这一过程中,编者需要大量阅读,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心得,需要与研究者保持互动,其学术组织能力、创新能力、问题意识、前沿意识,显得至关重要。编者要在学术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而非在后方大营接受战报。另外,编者还应对社会保持敏感性,办刊物不是为自己办,也不光是为学术圈子办,归根结底是为社会办,所以要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需求。成功的约稿能够激发学者的写作欲望,甚至

能够激发学者潜在的学术创造力。有时候,编者与作者的思维碰撞,能够产生很好的学术互动性,最终生成有创造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又能够给予读者学术启发与引导。刊物的学术生命力在哪里?实际上就体现在作者的优秀文章之中,体现在编者的学术组织之中,也体现在编者与作者的良性互动之中,体现在刊物对读者的思维启发之中。绝不体现于过度量化的、外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这种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学术创造力的多样性,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集体反思。

肖宇:您刚才提到办刊过程中作者也是可以培养的,这如何理解?

贺云翱:一般而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易脱离已有的学术积累、研究惯性,敢于突破自身知识体系、思维习惯的学者并不多。如果编者所办专栏具有创新意识,在约稿与集中编发的过程中,便会在学术界形成一定学术引导作用,带动作者对某一问题的联想思考与探索。所以,刊物也承载着培养学术队伍的责任。我坚持撰写《大众考古》卷首语,也是希望能够引领大家发现新问题,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新思考。

肖宇:学术访谈是您一直比较倡导的刊物栏目形式,尤其是对老专家的访谈,您自己也做过不少尝试,既当过访谈者,也当过被访谈者,请您具体谈谈对学术访谈的看法,如何理解这种学术体裁的价值。

贺云翱:我在办《东南文化》的过程发现学术刊物存在一个隐性问题——过分拘谨,不少学科带头人的前沿性观点、设想与独特感悟,只能在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分享,无法见诸于刊物,若是转写成中规中矩的论文,则很难反映其活跃的思想火花。所以,我考虑能否采用一种活泼、自由的方式,反映专家学者的所思所感,学术访谈无疑是最佳体裁。选择各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作为被访谈者,诸如苏秉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寻找学生辈的年轻学者作为采访者,两代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更具思维互动性。访谈形式既有面对面的聊侃,也有笔谈。做得成功的访谈不少,比如张爱冰先生对俞伟超先生的访谈,已成为经典之作。访谈需要带有研究性,采访者要有学术目的,甚至有些问题被访谈者可能从未意识到,是采访者提出的问题激发了被访谈者,感动了被访谈者。

学术访谈的价值与意义,我觉得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论文是学术观点与结论的规范化表达,而访谈则是学术思想及其产生过程的内在表达。



2010年6月“《东南文化》创刊25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合影

学术访谈以鲜活的学者个体为对象,洞见其论述背后的点滴思考,挖掘他们的心路历程,这是学者学术积累的另一面。其次,学术访谈的主要读者可能是青年学人,资深学者的成长经历、前沿观点、治学方法、理想追求与学术操守等,能够给年轻学人以重要的示范、借鉴与启迪。再次,学术访谈具有口述史的价值,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当代学术史,被访谈者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特征、学术格局。我办《东南文化》时有个愿望,将文博领域的前沿学者访谈一遍,集结成一部当代学术史。

黄督军:人才培养是您倾力较多的方面,既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硕博研究生,也为江苏文博系统培训了大量一线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更加适应当前文物考古工作的现实需要?

贺云翱:说真的,我喜欢当老师,喜欢讲课。大学二年级,我在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实习,晚上给地方文物工作者讲授田野考古知识。从1984年开始,我兼职在省委党校、省级机关党校、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和南京职工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后来又在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讲授“长江文化”“佛教考古”“古代玉器”“编辑学”等课程。可以说,我从毕业后就没有停止过讲课。

2002年回母校执教后,我发现高校教育与行业需要之间存在错位,大学主要培养的是考古学、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却很少输送文物鉴定人才,我曾参与南京市文物鉴定工作,参加过很多司法鉴定、文物定级鉴定,深感这方面人才的匮乏。另一方面,很多基层文物工作者,并非专业出身,亟需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于是,我和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合作,开办文物鉴定方向的专升本,为全国各地基层文物工作者的培养与提升提供途径,至今已有10届学生,每届学生大多超过百人。

在硕博生的培养方面,我对学生比较“放任”,学生可以在自由状态下寻找研究课题,甚至允许他们

失败、走弯路。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平等的探讨学问,老师的责任就是甘为人梯、成就学生。讲究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讲究创造性工作。我喜欢和学生谈理想,或者我本身就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那代人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将这一财富传递给学生,这在大学教育中至关重要。如何培养具有理想主义情怀、专业知识过硬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是对大学教育的挑战,也是我追求的教育目标。

大学教育有其自身规律,并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往往是灵活多变的。学非所用是很正常的事,大学教的是基本理论与方法,关键还在于持续不断的自我学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也要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研究,自觉回应社会实践的变化,回答时代命题,形成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再一点,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还要推动学生形成国际性学术视野,形成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兼备的学者情怀。

黄督军:世界遗产教育是您关心和倡导的教育内容,请您谈谈高校世界遗产教育问题。

贺云翱:之所以倡导世界遗产教育,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管理、法律、资金、科研、科技和教育等,均是世界遗产事业的支撑条件,其中教育是贯穿各类条件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世界遗产教育是世界遗产事业永续发展的关键性动力之一。其次,在世界遗产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极为重视世界遗产教育,这在《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文件精神中均有体现。再次,高校担负培养国家优秀人才的责任,青年大学生以后会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有的还会进入教育部门、政府管理机构,因而年轻大学生对世界遗产的认知程度,对世界遗产保护具有长远价值。

2004年,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标志中国世界遗产教育的突破性发展。当时我还参加了这个宣言的讨论。一方面,教育部将世界遗产教育纳入中学历史教学。另一方面,不少高校加强了世界遗产的教育、研究与传播工作,有些高校还开设了世界遗产的本科课程与研究生培养方向。

高校世界遗产教育,首先要向年轻学子传递世界遗产事业所蕴含的对待人类文明的先进理念,此外还应承担多项任务:为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发展输送经过系统培养的中、高级青年人才;设置与世界遗产事业发展相关的科研课题,并向社会提供有关



2011年8月参加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答辩

世界遗产研究的新成果;通过专业出版和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有关世界遗产的正确理念和准确知识;通过参与政府决策和自身理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行为,为推动世界遗产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表率;参与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

四、公众考古与时代担当

肖宇:目前,公众考古在繁荣的表象下隐伏着些许困境,诸如:公众考古实践流于形式或趋于同质,公共考古研究疏于理论探索。考古发现与考古学研究并未以自觉、有效的姿态转译为公众知识,进入公众生活领域。您怎么看待公众考古?

贺云翱:公众考古可以理解为,将考古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公众知识,并使公众获得参与感和知识陶冶。公众考古实践在中国出现较早,有学者进行过追溯与考证,但近十年来才真正引起普遍重视。公众考古实质上是考古科学的普及化、大众化,是民族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知识分子承担两大责任,其一是学术研究,展现科学创新成果和科学劳动的质量,其二是知识普及,对大众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公众考古还涉及民主化问题,人类民主化是知识从高处向低处流动的过程,马克思有一观点:无产阶级真正的贫困是哲学的贫困。因此,考古学家应有更加强烈的公共意识、使命感。如果我们仅仅封闭在学术圈搞研究,而无法唤起大众的科学考古意识、文化遗产意识。那么,考古学的长远健康发展难以得到保障,考古学的目标价值也难以实现。



2008年3月“南京市民学堂”科普讲座后
为听众签名

有一个颇值关注与反思的现实情况,大量以盗墓、考古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在当今社会广受年轻人追捧,虚构、扭曲的伪考古知识模糊了公众的

常识鉴别能力。公众考古的科学化、大众化程度没有达到社会正当需求,伪科学便会滋生、传播,甚至占据公众的知识常识,科学考古学反而跌落至边缘地带。无须讳言,问题在于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失语与缺位。

从我个人的实践角度,我主持发掘的几乎所有重要遗址,都努力使之保存下来,成为文博单位或遗址公园。作为遗址的发掘者,便兼有一份责任——你同时也是遗址的保护者、展示者和相关知识传播者。以前,我还曾做过一个文化遗产科普网站“华夏遗产网”,后来又创办《大众考古》。其实,很多人都受益过这样一批公共普及杂志,譬如《大众科学》《大众电影》和《大众医学》。在办《大众考古》过程中,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合适的作者,即便对于一些有学术影响力的考古学家而言,要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大众语言,仍颇具挑战性。再进一步讲,中国考古界将自己研究成果努力转化为日常知识的研究者,可谓凤毛麟角。

目前,公众考古确实存在明显瓶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尝试“突围”。一方面,考古行业缺乏一套机制来推动公众考古的全面发展,包括制度性安排、人员设置、成果评价和奖励办法,等等。大多数考古机构,没有专门的公众考古人员。在“文旅结合”的背景下,希望推动这方面的机制性建设。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并非语言通俗了、内容故事化了,就能达到公众考古的全部目标。举例而言,《十万个为什么》虽然语言十分通俗与朴实,但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公众考古绝非简单的宣传、讲解甚至搞笑,而承载着科学、理性的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

肖宇:您有不少研究工作是围绕城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承而展开的,诸如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城市文化遗产的规划,或是明清城墙的保护、地域传统工艺的传承,请谈谈文化遗产如何助力当代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文旅结合”的探索,文化遗产为城市经济发展也应做出应有之贡献,请您一并谈谈。

贺云翱:当前,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城市特色危机”,最直观的表现当属“千城一面”,城市文化品质亟待提升,市民文化认同度和文化凝聚力明显下降。究其原因,是对城市文化遗产缺乏科学认知、有效保护和传承创新。

文化遗产助力城市发展,在我看来是个实践性

问题,因为不同区域和城市的文化资源、历史轨迹、发展现状千差万别,需要在实践探索中因事而论,因城而论。文化遗产研究是对城市价值的发现,城市发展资本涵盖自然、人力、金融及文化等诸多方面,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隐性特点,在未揭示之前,甚至不为人知,通过研究、阐释和开发,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城市文化资源,赋予城市空间文化内涵和特质。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是文化的中心,而非物质的堆砌,当然我们不反对通过物质来表达文化。所以,做城市文化遗产研究,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在城市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物质生产迅速累积,精神生产跟不上物质生产速度,便会导致我们身心对抗。从发展趋势上判断,文化消费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文化遗产在新的生活背景、经济结构之中,必然要转化为社会发展资源。

过去存在一种偏见,考古学或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成果不应服务于旅游经济。在文化、文物、旅游一体化的格局下,我们有必要转变观念,文化遗产不应局限于象牙塔之中,供少数人研究与欣赏。只要我们

心怀人类福祉,为了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兼顾“文旅结合”,都没有违背学术初衷。当然,前提是要做好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坚持保护第一,否则就会出大问题。什么是“经济”?我理解的“经济”是“经国济民”,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国济民的资源,是一种时代担当。

观念的转变,会带动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工作方法的革新。我们的发掘与研究,不再单单以报告、论文为最终目的,而应思考文化遗产能给城市文明提供怎样的价值,以何种途径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肖宇:新时代,文博工作者有责任直面时代命题——“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贺云翱:文化遗产事业是个创新性事业,对文化遗产的每一次发现与阐释,都是其当代价值的呈现,正如历史总是常读常新。所以,博物馆里的文物、大地上的遗产和古籍里的文字,都可以不断地被当代人阅读和阐释。

从广泛意义上讲,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文化遗产,或者说我们生活在文化遗产之中,从栽培作物、衣食习惯,到人际关系、话语系统,都离不开文化遗产的滋养。所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让文化遗产更好的支撑我们的生活,并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前提,形成全民性意识,使物质与精神共荣、历史与现代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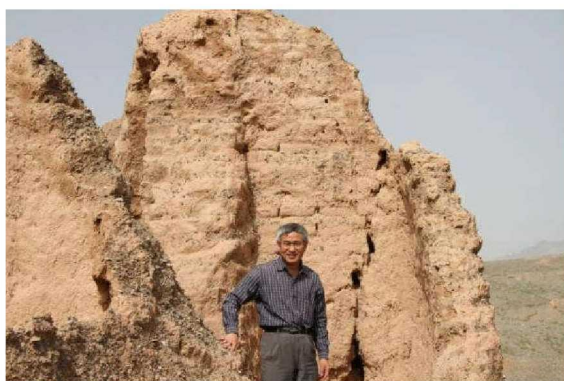
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和人类的寻根意识休戚相关。所有动物之中,唯独人类拥有自觉地寻根意识和寻根行为,不仅存在于每个人类个体,而且存在于每个民族、国家。人类的寻根意识,



2009年7月调研湖北兴山县昭君村文化保护与移民安全移址工作



2013年5月因“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课题考察张謇遗产



2013年8月因“丝路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课题赴新疆考察古遗址

是对生命根脉的传承,是对既往岁月的感恩,是对兴亡更替的感悟,是对历史规律的洞悉,是对真善美爱的追寻,是对无限未来的向往。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反复试验、重复验证,但对于人类社会,由于每一代人寿命的短暂,我们无法对人类历史进行直接观察。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及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从而为当代人呈现出观察历史、分享文化等多方面价值。人类偏见的产生,源于视野的狭窄、知识的局限、文化的封闭,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遗产突破了时间、空间与实践对人类的限制,让我们看见更加浩瀚的世界、更加博大的人生、更加多样的可能。

肖宇:您始终主张科研应当积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寻求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结合之道,探索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如何反哺文化建设,这在文博界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您为何如此重视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

贺云翱:这与我的价值观有关,笃信“知行合一”,将社会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如果某一科学事业不能推动人类幸福,那么这一学科就丧失存在意义。我有许多未完成的文章或书稿,还有很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都缺乏时间投入研究,而选择优先去做那些更具社会意义的事情。

文化建设是我主要实践领域,文化视阈是我观察问题的重要角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是我探讨具体问题的切入学科。社会的运转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的应用领域集中于文化建设。对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研究,使我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哪些方面需要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去支撑。我们国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建设,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彰显出文化建设的地位愈发突出,理应引起文化科研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我提交了不少与文化建设相关的全国政协提案,涉及乡村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考古事业发展、丝绸之路文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等。

肖宇:与其说您穿梭于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地域文化史等学科之间,毋宁说是将诸多学科熔于一炉,多维考察文化事项的复杂体系,揭示文化奥义,“会通”是您的学术特质之一。关注文化的代谢、嬗变、传承与复兴,自觉担纲文化阐释的现实使命,践

行“知行合一”,这是您学术实践的另一面。遗产和历史背后的主角是人类本身,对遗产和历史的关怀,归根结底是对人类的关怀。请您谈谈自己的文化观。

贺云翱:在研究过程中,我对文化有三点信念或感悟。其一,从地球的诞生到生命的肇始,到灵长类动物的演化,到智人的初蒙,再到人类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可概括为:从“天道”到“人道”,再到“文道”。人类文化的“文道”遵循“人道”,而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等的“人道”,则遵循宇宙运转的“天道”。其二,“文化”是人类本质的呈现,离开文化便无所谓人,文化促使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也能在未来帮助人类摆脱自身发展危机。研究文化就是研究人类的本质,以文化的视角来洞察人类社会,梳理过程,发现机理,探求规律。其三,“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古今皆是一体,统一于文化的创造者。当我们沉浸于某一文化事项的思考,便会进入宏大的时空运动之中,思维穿梭于古代、现代与未来。

肖宇:您的研究既是考古的文化,亦是文化的考古。有的学者通过博大而至精深,有的学者通过精深而至博大,您属于前者。最后,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

附记:本次访谈由《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先生策划,访谈大纲亦承其建议。2019年5至8月,贺云翱先生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数次接受访谈,不辞辛劳,访谈时长十余小时。

附录:贺云翱先生主要学术成果

一、考古与文物研究

1. 贺云翱:《原始人类居住情况综述》,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5集),1982年。
2. 贺云翱:《吴国城市建设述略》,江苏省考古学会编:《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1983年。
3. 贺云翱:《谈谈实验考古学》,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7集),1984年。
4. 贺云翱:《长江三角洲地区史前聚落的考察》,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8集),1985年。
5. 贺云翱:《江苏近年考古发现综述》,江苏省考古学会、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等编:《东南文化》(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尤振尧、贺云翱、殷志强:《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7. 贺云翱:《也谈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读马世

之先生文有感》,《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8.贺云翱:《论长江三角洲及太湖平原史前文化和环境的关系》,《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集》(《南京大学学报》增刊),1986年。

9.贺云翱:《南京林学院发现北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0.贺云翱:《论马家浜文化自南而北传播》,《史前研究》1987年第1期。

11.贺云翱:《南京草场门发现晋墓》,《考古》1987年第4期。

12.贺云翱:《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13.贺云翱:《从考古资料看两汉时代的江苏经济》,《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14.谷建祥、贺云翱:《中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圈之形成与交融》,《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15.贺云翱:《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16.贺云翱:《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17.贺云翱:《良渚文化“祭台”遗迹浅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8.贺云翱:《从考古发现谈中国隋以前的域外文化输入》,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2年。

19.贺云翱、阮荣春、刘俊文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年。

20.贺云翱:《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1.贺云翱:《在名城建设中崛起——镇江城市考古侧记》,《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2.贺云翱:《短暂的生命 不息的光华——熊海堂先生学术生涯记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23.贺云翱:《〈齐故平原将军太中大夫金乡县开国侯赵君墓志铭序〉及其考释》,《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24.贺云翱:《六朝“西州城”史迹考》,《南京史志》1999年第3期。

25.贺云翱、狄富保:《元〈合刺普华墓志铭〉考释》,《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26.贺云翱:《江苏元明考古》,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27.贺云翱:《江苏省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玉件及相关资料的初步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年。

28.贺云翱:《江苏明代墓葬的发现及类型学分析》,《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29.贺云翱:《南朝善业泥像鉴赏》,《收藏家》2001年第

6期。

30.贺云翱、邵磊:《南京出土南朝椁头装饰瓦件》,《文物》2001年第8期。

31.贺云翱:《〈明故南宁伯追封南宁侯谥庄毅毛公夫人白氏合葬墓志铭〉考略》,《华夏考古》2002年第4期。

32.贺云翱:《唐法灯禅师墓志铭考》,《文博》2002年第6期。

33.贺云翱、邵磊:《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

34.贺云翱:《长江文化与考古学刍议》,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35.贺云翱、邵磊、王前华:《明孝陵宫门址的发掘收获》,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36.贺云翱、邵磊、王前华:《明孝陵宫内东侧建筑基址勘探记》,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37.贺云翱:《南京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38.贺云翱、王前华、邵磊:《明东陵考古纪实及学术价值》,陈支平主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39.贺云翱:《良渚文化之“精神文化”探析之一》,《浙江学刊》2003年增刊。

40.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

41.贺云翱:《简评卢海鸣著〈六朝都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2.朱光亚、贺云翱、刘巍:《南京梁萧伟墓墓阙原状研究》,《文物》2003年第5期。

43.贺云翱:《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7期。

44.贺云翱:《南京佛寺概说》,杨新华主编:《金陵佛寺大观》,方志出版社,2003年。

45.贺云翱:《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文物》2003年第7期。

46.贺云翱:《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上)》,《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47.贺云翱:《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下)》,《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48.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兽面纹瓦当再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

49.贺云翱、邵磊:《南京毗卢寺东出土的六朝时代瓷器和瓦当》,《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

50.贺云翱主编:《考古学方法与理论》,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材,2004年。

51.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

年。

52. 贺云翱:《六朝钱纹陶瓷器初识》,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

53. 贺云翱:《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瓦当初探》,《东亚考古论坛》(创刊号),(韩国)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

54. 贺云翱:《〈冶山存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评介》,《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55. 邵磊、贺云翱:《郑和与江苏——江苏郑和遗迹考述》,《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56. 贺云翱、邵磊:《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1期。

57. 贺云翱:《发现最早的地坛遗存——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8. 冯慧、贺云翱:《南京新出土六朝钱纹陶瓷器标本研究》,《东亚考古论坛》(创刊号),(韩国)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

59. 贺云翱主编:《中国金银器鉴赏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60. 贺云翱、申伊欣:《好花也需绿叶扶——文物考古界资深编辑朱启新先生访谈录》,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61. 贺云翱:《东亚地区出土生产系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东亚考古论坛》(第2期),(韩国)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6年。

62. 贺云翱:《六朝文物的一次大检阅——读罗宗真、王志高先生著〈六朝文物〉》,《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63. 贺云翱:《南京出土明〈国子监生赵君墓志铭〉》,《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64. 贺云翱、路侃:《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65. 杨国庆、贺云翱:《南京城墙初论》,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66. 贺云翱:《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南朝瓦当及与南朝上定林寺关系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67. 贺云翱、路侃、陈琳等:《江苏古泗州城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4日版。

68. 贺云翱、邵磊:《中国金银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69. 贺云翱、冯慧、李洁:《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70. 王国奇、贺云翱、周桂龙:《河南南阳市邢庄汉、宋墓群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71. 贺云翱:《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72. 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椁当初研》,《文物》2009年

第5期。

73. 贺云翱:《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4. 贺云翱、郭怡:《古代陵寝》,文物出版社,2010年。

75. 贺云翱:《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

76. 贺云翱:《南京独龙阜东出土南朝石塔构件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

77. 贺云翱:《三国两晋南北朝城市考古的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1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78. 贺云翱:《江苏六朝帝王陵综合调查与研究》,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200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9. 贺云翱:《南朝瓦总论》,《古代东亚造瓦技术》(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研究报告第3册),(日本)株式会社明新社出版,2010年。

80. 贺云翱、樊桂敏主编:《中国华东考古文献》(共19卷),学苑出版社,2010年。

81. 水涛、贺云翱、王晓琪编:《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2. 贺云翱:《“六朝瓦当”研究回顾及对若干问题的探讨》,《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83. 廖望春、贺云翱:《略论金银器物的艺术语言》,《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84. 贺云翱:《屋檐上的艺术——古代瓦当鉴藏专题》,《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

85. 贺云翱:《从六朝莲花纹瓦当探南北文化交流传播现象》,《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

86. 贺云翱:《一代风华 两位女杰——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和游寿先生礼赞》,贺云翱主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7. 张萍萍、贺云翱、周桂龙:《江苏宿迁区府广场五号西汉墓发掘简报》,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八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88. 贺云翱:《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

89. 贺云翱、邵磊:《南京石头城遗址1998~1999年勘探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90. 邵磊、贺云翱:《南京铁心桥杨吴宣懿皇后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91. 贺云翱:《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92. 贺云翱、翟忠华、夏根林、冈村秀典等:《三至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3年第1期。

93. 费和平、贺云翱:《试论江西出土宋代石室墓的形制与意义》,《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94. 贺云翱、王碧顺:《宿迁市灵杰山汉墓群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

95. 王碧顺、贺云翱:《泗洪郭嘴汉代墓地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

96. 贺云翱、周桂龙:《南京市清凉山石头城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

97. 贺云翱、周桂龙:《南京市玄武湖明代黄册库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

98. 贺云翱、周桂龙:《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里尤家凹墓地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0~2011),南京出版社,2013年。

99. 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与建筑功能区的关系分析》,《韩国瓦学会国际讨论会文集》(韩国),2014年。

100. 秦伟主编、贺云翱副主编:《原始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101. 贺云翱、郭俊主编:《中华国宝图典》,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

102. 贺云翱:《谈瓦说陶》,南京出版社,2014年。

103. 贺云翱、王碧顺、路侃:《明孝陵下马坊区域考古勘探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04. 贺云翱:《“宜兴窑”初论》,《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105. 贺云翱:《中国出土3~6世纪文字资料概观》,日本明治大学主编:《古代学研究所纪要》(第23号),2015年。

106. 贺云翱、费和平:《蒋赞初》,钱伟长总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

107. 贺云翱:《汉晋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考古学观察》,秦臻主编:《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8. 贺云翱:《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

109. 贺云翱:《概说宋瓷的特质》,《东方收藏》2016年第6期。

110. 贺云翱、王碧顺、晁剑虹:《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墓地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4~2015),南京出版社,2017年。

111. 贺云翱:《研究中国古代砖瓦窑制度和明南京都城垣的重要史著》,贺云翱、郑孝清主编:《中国城墙》(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112. 贺云翱、王碧顺、周桂龙:《南京市江宁区船墩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113. 贺云翱、王碧顺、周桂龙:《南京市清凉山六朝石头城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114. 贺云翱、陈思妙:《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专题报告》,《中国海洋文化蓝皮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

115. 冯慧、贺云翱、路侃:《南京新出土六朝钱纹陶器瓷器标本研究》,贺云翱主编:《古陶瓷学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二、文化遗产研究

1. 贺云翱:《博物馆与考古学》,《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3期。

2. 贺云翱:《文化研究在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中作用刍议》,《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1期。

3. 贺云翱、廖锦汉:《明孝陵规划设计思想蠡测》,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贺云翱:《走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钟山风雨》2003年第3期。

5. 贺云翱:《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解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孝陵博物馆:《世界遗产论坛·明清皇家陵寝专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6. 贺云翱:《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综合研究及个案分析》,《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日版。

7. 贺云翱、王前华:《明文化与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国明史学会、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

8. 贺云翱:《漫漫“申遗”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难忘火红年代——建设者口述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9. 贺云翱:《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之思考》,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10. 贺云翱:《关于中国世界遗产教育问题的思考》,《世界遗产》2007年创刊号。

11. 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2. 贺云翱主编:《紫砂大师访谈录》,文物出版社,2008年。

13. 李洁、贺云翱:《江苏文化遗产对江苏经济社会的贡献》,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明孝陵博物馆等编:《世界遗产论坛》,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 夏增威、贺云翱:《江苏省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明孝陵博物馆等编:《世界遗产论坛》,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 贺云翱、周钰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第三届“世界遗产论坛”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明孝陵博物馆等编:《世界遗

产论坛》，科学出版社，2009年。

16. 贺云翱：《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萃〉出版而作》，《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3日版。

17. 洪雅、贺云翱主编：《陶都文化探胜》，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贺云翱：《江苏省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建立的调查与研究》，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2003），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 李洁、贺云翱：《江苏省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2004~200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 贺云翱、蔡龙主编：《滨江明珠——南京幕燕滨江风貌区历史与文化》，译林出版社，2010年。

21. 贺云翱主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2. 贺云翱：《走近“文化遗产学”：问题与对策——贺云翱教授专访》，《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

23. 贺云翱：《对加强我国区县文管所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8日版。

24. 贺云翱：《关于我国“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事业宏观背景和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文化编：《江海行大道 开明铸辉煌——2011 开明·江海文化论坛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

25. 贺云翱、蔡龙主编：《认知·保护·复兴——南京评事街历史城区文化遗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6. 贺云翱：《文化遗产管理者的理性思考——读束有春〈传统与现代〉》，《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12日版。

27. 贺云翱、干有成：《现代化背景下“闽都文化”内涵、定位及发展指向分析》，福建博物院编：《春华秋实——福建博物院 80 周年纪念文集》（1933~2013），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

28. 贺云翱：《“联合申遗”是中国的重要选择》，《世界遗产》2013年第5期。

29. 贺云翱：《历史文化资源与江苏当代文化建设关系研究及政策建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科学发展 两个率先——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2012 年成果报告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30. 贺云翱：《历史文化资源对城市及区域文化发展力建构的作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科学发展 两个率先——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2012 年成果报告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31. 贺云翱主编：《文化三峡：三峡库区地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2. 贺云翱：《对促进三峡库区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步思考》，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九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3. 贺云翱、张勇盛主编：《宜兴紫砂》，译林出版社，

2013年。

34. 贺云翱、干有成主编：《“一湖两河”尽风流——南京玄武湖和内、外秦淮河文化探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35. 贺云翱、钱洁主编：《认知·保护·复兴——南京外秦淮河廊道空间文化遗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6. 贺云翱、朱棒：《宜兴紫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37. 贺云翱：《紫砂》，译林出版社，2014年。

38. 贺云翱：《博物学思维对跨学科研究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6日版。

39. 贺云翱：《冲突还是协调：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名城》2015年第1期。

40. 贺云翱：《“新常态”下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地位认知》，《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1期。

41. 贺云翱：《“十三五”江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路研究》，刘德海主编：《谋划“十三五”建设新江苏——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成果集（2014）》，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42. 贺云翱主编：《闽都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

43. 贺云翱、景陈主编：《南京秦淮新河流域文化遗产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44. 贺云翱：《江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考》，《群众》2016年第4期。

45. 贺云翱、陈思妙：《明清城墙的城市规划影响力——以荆州城墙、襄阳城墙为例》，《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

46. 贺云翱：《“区域”视野下的江苏发展问题》，《新华日报》2016年11月3日版。

47. 贺云翱、徐称心主编：《无想山文化探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48. 贺云翱：《文化遗产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49. 贺云翱、景陈主编：《南京秦淮区水文化遗产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0. 贺云翱：《文化遗产事业的当代实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等编：《第一届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论坛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1. 贺云翱：《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样板》，《群众》2017年第19期。

52. 丁雪、贺云翱主编：《江宁区文物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3. 贺云翱、蔡龙主编：《江北文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4. 贺云翱、蔡龙主编：《六合文庙传统街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5. 贺云翱、蔡龙主编:《浦口火车站工业遗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6. 贺云翱、蔡龙主编:《永利鋸厂工业遗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57. 晁舸、贺云翱:《栖霞寺千佛崖石窟保存现状与对策分析——兼议东南地区的石窟保护》,《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58. 贺云翱、干有成:《革命文物保护的意义和路径》,《群众》2018年第6期。

59. 贺云翱主编:《南京门西历史城区文化遗产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60. 贺云翱、陈思妙:《中国交通运输文化遗产的初步认识》,《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61. 贺云翱、陈思妙:《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

62. 金卫东、贺云翱主编:《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史迹》,南京出版社,2019年。

63. 贺云翱、赵永艳主编:《雨花英烈精神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64. 贺云翱、邵会春主编:《红色江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65. 贺云翱、干有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认知及若干思考》,《瓷萃》2019年刊(总42期)。

三、历史与文化研究

1. 贺云翱:《洪泽湖小史》,《江苏教育》1983年第5期。

2. 贺云翱:《徐国史初探》,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6集),1983年。

3. 贺云翱:《徐国史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4. 贺云翱:《历史上东南地域简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5.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贺云翱:《长江文化研究的两点设想》,《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7. 贺云翱:《历史与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

8. 贺云翱:《东晋时南京未曾称“申”》,《南京史志》1998年第2期。

9. 丁家钟、贺云翱:《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0. 贺云翱主编:《汤山风情》,南京出版社,1999年。

11. 邵磊、贺云翱:《“长江文化”纵横谈——梁白泉先生访谈录》,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12. 张正明、贺云翱:《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对话》,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3. 贺云翱:《郑和与金陵大报恩寺关系考》,《东南文化》2007年第4期。

14. 贺云翱:《张正明先生与“长江文化”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12期。

15. 贺云翱:《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南京》,叶皓主编:《走进市民学堂》(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16. 贺云翱、干有成:《试论大家族文化与无锡近代名人辈出现象的关系》,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六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17. 贺云翱主编:《无锡人与中国近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 贺云翱:《南京历史文化特征及其现代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 贺云翱主编:《百年商埠——南京下关历史溯源》,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

20. 贺云翱、翟森森:《三峡库区文化体系建设的探索——贺云翱教授访谈录》,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八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1. 贺云翱:《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初论》,《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2. 贺云翱:《正确认识“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群众》2012年第11期。

23. 贺云翱主编:《魅力滨江——南京下关发展揽胜》,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

24. 贺云翱主编:《首善之区 幸福鼓楼:南京鼓楼发展揽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25. 贺云翱:《中国现代化,要立足传统文化再出发》,《新华日报》2015年12月2日版。

26. 贺云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艺术百家》2016年第2期。

27. 贺云翱、刘德奉:《访谈: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重视文化发展》,《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

28. 贺云翱、周运中:《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29. 贺云翱、苏宇红:《南京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等编:《第一届文化遗产与创新国际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30. 贺云翱、周行道:《文化南京:历史与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